中外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3· ·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兴于上世纪70年代，历经了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研
究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并带来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迁移。其学科体系从冷战格局中“中国研
究”的一个分支，转变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的客体对象之一；其学术立场、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 ·2017/3 江苏社会科学
一、从“中国研究”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美国对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兴于70年代，是冷战格局下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边缘性分支。通过分析、评
价、批判同时期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英文版儿童文学作品，解读中国的政治风向，考察中国未来主人
翁的样本性和典型性。以美国本土学者Thomas A. Zaniello、Nellvena Duncan Eutsler为代表，对文革期
间、拨乱反正期间的儿童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进行刻意的解读。上世纪
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产生新变，从“中国研究”的边缘分支进入到“儿童文学”
学科体系中。这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有关，也缘于其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转变，更与
Mary Ann Farquhar、Jane Parish Yang、Margaret Chang、Xu Xu等学者的努力不无关系。
事实上，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美方一直抱有好奇心与解读欲，如Thomas A. Zaniello相
继发表了《五个英雄：中国儿童文学一瞥》（Heroic Quintuplets: A Look at Som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
ture）[1]
、《绽放的鲜花：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性》（Flowers in Full Bloom: The Variet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2]
，对整个文革阶段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传统儿童文学的被筛选、当代
儿童文学创作主题的“小英雄化”叙事，尤其是“红小兵”的多种样本，做了充满政治意味的解读。《五个
英雄：中国儿童文学一瞥》（1974年）以《中国五兄弟》、《金斧子》等传统民间故事为例，比对了在美国
的传播版本与中国本土版本的区别，阐述了这一类型的传统儿童文学为何能够被1949年以后的政治
文艺形势所接纳，讨论了它们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是怎样被改写和认知的。以《密信》、《椰林中》、
《勇敢的小牧人陆超》（音译）、《跟着爷爷打猎》、《小龙》、《今天我值日》等英文版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
品为案例，阐述了儿童“小英雄”的榜样性意义。文革期间，文学中儿童形象的“士兵化”现象普遍。《绽
放的鲜花：中国儿童文学的多样性》（1978 年）分析了《今天我值日》、《暴风雨》、《三件毛衣》、《好孩
子》、《小红卫兵》等70年代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小红卫兵”的多样性。政治围城中的当代儿童文
学，其独特性表现为既与西方儿童文学隔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切割。但是民间故事、通俗文
学仍被谨慎而有限度地采纳了。比如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双结合的甄选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被刻记上了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话语中被改造的必然命运。尽管Zaniello
对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有较多的关注，但是常常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当他刚刚断言《金竹》体现了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倾向，《中国文学》（英文版）刊登了北京小学生的“群众来信”，
以《金竹》为批判对象，并发表了《每一面墙都是战场》的诗歌。儿童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都令Zani⁃
ello吃惊和困惑，最终他认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缺少浪漫、幻想气质，其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和目的是
为政治任务服务。在西方视域中，当代中国儿童与儿童文学无疑成为一个极具研究性的“他者”。
真正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进行现场专题研究的是Nellvena Duncan Eutsler。他以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研究为主旨，于1979年1月参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学校、图书馆，通过文献资料搜集
与现场考察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儿童文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东方之旅：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
教学媒介之印象》（Journey to the East: Impression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nstructional Media in Con⁃
[1]Thomas A. Zaniello, Heroic Quintuplets: A Look at Som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4(3):
36-42.
[2]Thomas A. Zaniello, Flowers in Full Bloom: The Variet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78(7):
181-190.
176

中外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3· ·
temporary China）[1]
。与此前的研究方式相比，该论文着眼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更以美方儿
童文学为参照，进行了相关类型和价值的比较研究。毫无疑问，西方学者热衷于探寻当代中国历经政
治与文化革命后的传统文化的痕迹。Eutsler随身携带了《三字经》，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 ·2017/3 江苏社会科学
的《儿童文学概论》（1982）、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室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
此后的系列论文、相关专著、高校教科书层出不穷，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可
见黄庆云的英文论文既向美方同行宣示了迥然于美式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路径，也代表了彼时
国内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知识考古”的最新态度、意识和方法。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学科体系与学术立场的过渡，个中原因大致如下：其一，
儿童文学专业并非人文社科热点，不像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解读现场。其研究的
“滞后性”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成果能够为儿童文学专业更理性地吸收、扬弃。其二，美国
的儿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方式更关注儿童主体的阅读接受，儿童文学与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儿童
权益、儿童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研究模式正应和了大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凡起例的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得到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多方关注，获得了学理
性的多元发展。其三，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在过去三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意识形态原则”、“文学
自主原则”、“市场化原则”的博弈与共谋，以及文本形式和传播渠道多元化、创作主体的泛化等新变，
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也呈现出当下儿童文学全球化的共性特点，使得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当代
儿童文学”有了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共同体”。因此，顺应文革后的政治文化变局，将儿童文学回归
“文学”体系，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立场看待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近
三十年的发展实况，也开启了美国学界将中国儿童文学纳入其“儿童文学专业”研究对象的肇端。
二、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的迁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从隶属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逐步回归到儿童文学专业（Children’s Literature）的研究客体
中，其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也随之变化。重点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全面、深入、多角度的
梳理和评价；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的纵向挖掘与横向比较。
1. 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梳理、对不同时段儿童文学发展阶段的关注、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
过程中的重要人物的解析、对1949-1978时段中国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解读，以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
探讨和交流。
第一是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梳理、评价与回应。如Nellvena Duncan Eutsler 对《中国通
俗文学与儿童》一书的评价[1]
，即是对中国文化中的儿童文学做了梳理和回应。《中国通俗文学与儿童》
的作者施高德夫人（Dorothea Hayward Scott）曾担任香港图书馆协会首任主席，该书由美国图书馆协会
出版[2]
。论著列举了中国的各类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话本、戏剧、木偶戏、童谣、谚语、谜语，介绍了龙、
凤、摇钱树、门神等中国传统意象。传统文化的高度发达给中国儿童的早期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民间故事的模式化也使得它们在几千年的传播中具有超级稳定性；佛教东传带来了更多的口头民间
故事类型；象形文字使得中国的书面语和故事文本更具形象性、更利于儿童接受；文本书面化、印刷读
物的发达，使得儿童的阅读史广泛、深入、悠久……正是这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环境、口头与书面语言传
播状态、宗教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继承人。施高德夫人通过
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凸显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东方特质。在第七章“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
发展”中讨论了西式教育模式的引入、教会学校、五四运动、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西方小说的译介、白
[1]Nellvena Duncan Eutsler, Chinese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Children's Literature, 1982(10):183-185.
[2]Dorothea Hayward Scott,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178

中外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3· ·
话文运动、周氏兄弟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公共出版物、童书（包括刊物、图画书等类型）的
出版（如张乐平的“三毛”漫画、丰子恺的作品）……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展的脉
络。施高德夫人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1909年，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式“教化”的理念下，生成了一套
稳定的传承体系，其辐射范围和影响时段超过多数其它民族的文明传统。她著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
让读者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儿童是如何被“塑造”的（shape）；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施高德夫人称之为the Marxist People Republic）时期被抛弃、替换了。施高德夫人颇
得中国当代文化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真昧，她对这个“异邦”的稔熟和情感，带来了这项研究的片面性深
刻。更有意味的是Eutsler的书评，一改1979年访寻中国儿童文学现场时的傲慢，似乎也从该书中获
得启发，较为审慎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儿童间的关系有着深远和复杂的关联，并以鲁迅的“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文章结语。能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变异性与现代化带来的嬗
变，能够以学理性的立场讨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预示着美国相关学界的学术立场的转变和研究范
式的迁移。
从1986年黄庆云首次在美国权威儿童文学研究期刊《狮子与独角兽》上发表《中国儿童文学综
述》以来，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谱系不仅得到刷新式梳理，而且真正进入到儿童文学专业的学
科体系中，成为儿童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研究对象之一。当然，黄庆云这篇4页的英文论文仅是简述
了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概况，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与特征未能作出全面而有深
度的阐述，直到《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1]
的出现。作者Mary Ann Farquhar 对中国1920-1980 年间的儿童文学发展史做了充分的说
明。在这本著作中，传统文化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与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叶圣陶与
冰心的作品特质、战争期间的儿童文学作品、1949年以后的中国卡通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儿
童文学作品、后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文学发展等均得到了详略得当的介绍和分析，勾勒出清晰明确的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以跨语际实践的方式让英文世界体察到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转变与革命
化叙事的生成性与权宜性的逻辑关系，可谓是海外同仁研究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入门基准（Canon）[2]
。
第二是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重要发展阶段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特点的深
入评析。国家民族话语的元叙事给中国儿童文学刷上了一层底色，文学所呈现的“儿童”与国家民族、
政治、社会、历史和人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关联意义，它的样本性意义不言而喻。Kate Foster的专著
《中国文学与儿童：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中的儿童与童年》（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3]
再一次关注了中国“儿童”被成人观念、社会
价值、政治意识“殖民”化的后新时期。对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文学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以23位作家的31本小说作品为样本，分析了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儿童”与五四文学以来的“儿
童”的异同，并将这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特征放置在中国文学、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的嬗变大背景中，
强调了这一时期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文学批评、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中西方对儿童的
“想象”语境中探讨了纯真童年、父母与儿童关系、向内聚焦的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等问题。该书后半
[1]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New York, London: M.E.Sharpe, Inc,
1999.
[2]Henrietta Harrison, Reviewed Work: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by Mary Ann Farquhar,
The China Journal, Jul., 2000(44):164-166.
[3]Kate Foste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l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asing⁃
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79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
·2017
/
3 江苏社会科学
部分论述了80
-90年代中国小说中繁杂多样的叙事策略
。性别
、阶层
、民族等构建的社会身份，“独生
子女
”政策等系列社会现状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
，该书出版后不久
，来自美国
中央密歇根大学的Xu Xu和香港大学的杜艳
（Daisy Yan Du
）分别发表了书评
[
1
]
。Xu Xu 认为Foster
对
中国当代小说中
“儿童
”的被压抑
、被腐蚀
、被抛弃的叙事模式是上世纪80
-90年代畸形化
（malformed
）
的中国文化的
“信号物”（signifier）。杜艳认为该书能够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与儿童想象构成互文
关系
，对中国小说中的
“儿童
”
与
“中国童年
”的解读颇有说服力
，并填补了西方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
究的学术空白
。可以说
，两位华人学者Xu Xu和杜艳对此书的回应
，显现出相关学术问题国际交流空
间的开阔自如
，呈蝴蝶效应般营造着场域中的身份意识和学术对话
。
第三是对历史细节的挖掘
。主要着眼在两个端点上
：一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关注
，
二
是对
 
òԀ Ĵᄁ㓀ፂ荆Ĵ䊃䘑Ĵ☀ࢀፏ㔠ፀ䀁㓺卒硄ᤣ。ဃ㨀
͒硄ᤣ。ဃ㨀与，：덠‵牛镆䌀比㋀是ᔔ儴�܈瀀ᬵ割高 ꀅ䀃瀀的关注： U• > %BJVń流空，与 %BJ_㐐硴捔ၸ犃䘀⠴楣瞖蕦⧄霹萀ࡰ㕲锵➀个端点上  ， ĳꕠ뀂퀀号物”” ⅅ㌆単Ɂ醧洀匀愀号物 NBMGPSNFE 被腐蚀一提的是 Ĵ±က䍝荆Ĵఁ㐀ፀࢀፏ㔠ᕅࢀፏ鈁㐔鴵–䂟倓䱵ࢀፏ提的是与。 NBMGPSNFE 被腐蚀왵公ᆖ耡ぐ쀁䖞蝐ᑑ즃ࢀᑐŅ蝐ᑒ荆Ĵ䁙䓯Ĵ伵–䀅送㐁综㑠ፀĴ⠴愐ፂ怀蠁㐽远耓伐ፁ䣡Ĵᐰ퀀号物。 Ɩ蛲ԁ隆⁨hh䚖栄น栆耈㑩暀ᥨȆ肖㡨น栁꽨ϗ表h༱넓祖荃䚓へ㐛᎔炆�܈瀀ᬸ昄耀得一提的是逓乀ፁ혰ፅ倽휀腐蚀一提的是읐提的是。욀Ĵ  流空。 %BJS，一提的是 %BJ\蠀ų䕁衱獆瓱煳䙻᜴柑᜗㑧众㑧ܱ獆矁獆琰퐗㑧珞㑧簃�腐蚀”提的是号物 ͅ包Ԁ与 NBMGPSNFE 与一提的是被腐蚀被腐蚀  %BJT7的关注 ̸ɀ㠂ጳ耦䀽휀腐蚀被腐蚀 %BJT鷔中⤴中群。被腐蚀被腐蚀 ݔ琛嬷呴美睔瑵䝁怀畇羧ݔ眎呷终ݔ眖䬇呷兴ݔ睂켇呷஧"� 。 ݔ矇呦Y畇睔眨㑧呷等䝱荆畇煠ށဖȰȐ ݔ眣ᵵ䝲靔嗰。被腐蚀。 ٦釆暖⁦楣䮧晩晦阜塦楤끦楡怀晩挨㞁ဖȰȐ 二。  。 %BJTᖀᒀ樨ň᠁䠜墀ᒀ䬈ňኳ耔蠁䠜㠁䡰ࠁ䡃힀ᒄ瀀被腐蚀一提的是 ࠁ✗㰸ħꪰ耒琪　提的是提的是被腐蚀与 ΤȂጦㅱɐ᐀提的是。被腐蚀提的是与被腐蚀提的是被腐蚀

中外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3· ·
来。以Jane Parish Yang、Xu Xu等为代表的华裔学者，在本土文化积淀与美式理论训练的张力中，对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与重要文本做出了多元、丰富的阐释。他们在“去帝国”、“去冷战”、“去殖民”
的学术方法与理念中，在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张力之间，以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内部与外部相
结合的研究方式，深层次地挖掘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塑造未来民族性格”[1]
的集体无意识，不断修
改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阐释机制，并建构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一种研究模式。如Xu Xu的论文
《“毛主席的孩子”：〈闪闪的红星〉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儿童”建构》（“Chairman Mao’s Child”: Sparkling
Red St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2]
，以《闪闪的红星》为样本，检
讨自新文化运动“发现儿童”以来，“儿童”是怎样被一步步塑造为民族国家话语中的理想化儿童。
Jane Parish Yang论文《家庭的改变：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家庭想象（1949-1993）》（A Change in
the Family: The Image of the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49-1993）[3]
考察了中
国传统伦理核心价值中的“家国”关系的现代变迁，深入探讨了“家庭”在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位置
和意象，凸显中国儿童被塑造的过程。Yang把当代儿童文学分为四个时段：1949-1966，1966-1976，
1976-1985，1985-1993。1949之前曾出现过的自然的、个体的、消极的、动摇的文学叙事迅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家庭和儿童，长辈往往是封建的、充满小农思想和私利意识的反面
角色，而儿童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1966-1976文革时段的儿童文学遭遇了毁灭性
的遏制。1970年恢复出版图画书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品中，儿童没有自身的快乐和童趣，
只有为阶级斗争而存在的意义。儿童的先锋性、革命性被无限放大了，文学中的儿童几乎都是小士
兵、小英雄，他们与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私属关系做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家庭”消失了。1976-1985
中的伤痕文学中，家庭开始回归，甚至有了国家和家庭间的价值冲突。对文革的反思、对其遗害的警
惕，也通过“儿童”折射出来（如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而1985年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中，
儿童不再是完美的小战士，恰恰相反，独生子女现象造成了无数被宠坏了的儿童，他们任性、自私、懒
惰，缺少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在父亲角色淡出儿童文学视野时，母亲变成了家庭生活的核心，而堂表
兄弟、伯舅、（外）祖父，以及男性教师、男性官员成为了儿童社会化的引导者。“儿童”在中国当代文学
中不断变迁的形象构建，反映出时代文化的剧烈变动。
通过上述论文，可以看到美国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既有了切入点的微观把握，在中国
材料和西方理论方法之间驾驭自如；也有了整体性的宏观认知，形成了客观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和思维
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了点与面的多维度研究体系。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
成熟与影响力的散播，许多华裔学者对这一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
的延伸，既强化了西方对这一研究时段的解读欲，又补充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类型和主题，也
进一步维护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稳定性。
2. 对中国题材、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比较研究。
在美国的儿童文学领域，对中国素材的关注一直不绝如缕。如著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New⁃
berry Medal），早在1926年、1933年分别获得金奖的作品《海上的神》（Shen of the Sea）、《扬子江上的杨
福》（Young Fu of the Upper Yangze）都是以中国神话传说、民间生活作为故事背景。华裔作家Laurence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2]Xu Xu,“Chairman Mao’s Child”: Sparkling Red St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
ti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Volume 36, 2011(4):381-409.
[3]Jane Parish Yang, A Change in the Family: The Image of the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1949-1993, Children’s Literature,1998(26):86-104.
181

美 国 的 中 国 现 当 代 儿 童 文 学 研 究 述 评
· ·2017/3 江苏社会科学
Yep所创作的充满中国元素的《龙的翅膀》（Dragonwings）、《龙门》（Dragon’s Gate）分别获得1976、1994
年的纽伯瑞银奖。2016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杨谨伦（Gene Luen Yang），其代表作《美生中国人》
（American-Born Chinese）将中国民间传说、华裔移民生活和美式漫画融合起来。上述皆为美国儿童文
学创作文本中的“中国”素材，但是对中国题材、中国文化的整理与分析工作较为滞后。从笔者搜集的
资料来看，较多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想象多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时间段，多以白人
的探险故事勾勒出东方古国的神秘、奢靡和没落。Patricia Dooley的论文《瓷器·辫子·宝塔：19-20世
纪插图版〈夜莺〉中的中国想象》（Porcelain, Pigtails, Pagodas: Images of China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Il⁃
lustrated Editions of“The Nightingale”）[1]
以安徒生的《夜莺》为切入口，追溯了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
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ese Style），《夜莺》构成了对神秘东方浪漫想象和真实中国的双重鸣奏。Dool⁃
ey考察了1893年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检索了1861年至今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有关
《夜莺》的40个版本。无论是水彩插画中的中国元素，还是《夜莺》中的灯塔、冠盖、羽扇等意象，Dooley
认为以《夜莺》为代表的西方童话一方面在创造（invented）中国，浪漫化中国想象；另一方面在历史细
节中研究中国，并与浪漫想象中的中国形成互文性。类似的研究还有Lorinda B. Cohoon对路易莎·梅·
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说《八位堂兄弟》的中国想象，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东方学的解读[2]
。
2014年Shih-Wen Chen的专著《英国儿童小说中的中国形象（1851-1911）》（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1851-1911）[3]
以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18本儿童小说为研究资
源，从冒险故事、战争故事中分析英国小说中的“中国想象”。与《夜莺》中的中国形象的浪漫奢靡相
比，此时西方儿童文学中的“中国”更为神秘、残暴和懦弱。
Judith V. Jechner《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儿童想象》（The Image of the Child in Chinese Folktales）[4]
通过
对“神笔马良”、“中国六兄弟”等中国民间故事不同版本的分析，认为中国“儿童”或以赤子之心成为成
人的保护者、救赎者，或以忠贞、牺牲的形象出现在民间故事中。类似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如《中国
儿童文学的过去与现在》[5]
，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儿童的“成人化”、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当代中
国儿童文学中的新质（如《皮皮鲁与鲁西西》的出现、以图画书为代表的新文本）等有非常流畅的梳
理。另外，中国当代教育重负下的儿童[6]
、1980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武侠”元素[7]
等
主题也进入到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中。这一类研究既有对中国儿童文学过去与现在的梳理，对
当下中国儿童形象的剖析，也有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分析与归纳，着眼于中国
文化语境中的儿童形象，且在多样文本中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值得注意的研究还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如Lan Dong的专著《中美两国的木兰传说与传
[1]Patricia Dooley, Porcelain, Pigtails, Pagodas: Images of China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Illustrated Editions of“The
Nightingale”,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79 Proceedings: 94-105.
[2]Lorinda B. Cohoon,“A Highly Satisfactory Chinaman”: Orientalism Girlhood in Louisa May Alcott’s Eight Cousins, Chil⁃
dren’s Literature, Volume 36, 2008: 49-71.
[3]Shih-Wen Che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1851-1911, Burlinton, VT: Ashgate, 2013.
[4]Judith V. Jechner, The Image of the Child in Chinese Folktales,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91 Pro⁃
ceedings: 174-180.
[5]Dr Laino Ho,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n and now,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01
Jul 2009: 127-137.
[6]Yu Chai Fang,Wang Lin,“A Hard Night”, a 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y by Yu Chai Fang,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ume 21, 1993: 135-140.
[7]Qi Tongwei, Traditiongal Culture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fter 1980, Bookbird: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l⁃
dren’s Literature, Volume 53, 2015(4): 62-65.
182

中外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3· ·
播》（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1]
既溯源了前现代化中国的“女英雄”、
“女战士”的流变，儒教文化中的女性价值评价，“白虎星”传说所折射的民间文化；也分析了美国多种
图画书中的花木兰形象的多样性，随着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的热映，木兰性格与命运的“国际化”嬗
变等问题。上述研究均为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在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出版社发表的论
文和专著，可见学者的文化身份、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学术交流的多元化。
结语
纵观五十年来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其学科体系和学术立场、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都
有了极大的变化。其潜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观其相
关领域的现状。这一学术路数、思维模式仍存在于美国儿童文学研究场域的集体无意识中，影响到了
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精准性。因此，以批判和分析的态度理性对待美国的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厘清“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2]
，对于中国
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代变革，既无法完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无法照搬西方儿童
文学的现代化模式。这既呈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也预示了不同思想、理论、方法、观念的介
入，可为专业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对话交流。在互为“他者”所
带来的批评与对话中，在检讨各自“区域中心主义”倾向中，在不断建制与修改中，探索其合法性与表
述体系，扩容、深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新起点，也
是中国儿童文学价值重建的必然性学术诉求。
〔责任编辑：平啸〕
[1]Lan Dong,
1
1
1
1
1
Ē耨㑦耱咗塂쇁쁹ƴἩ顠ʙ蘕㥈鑌ᰀ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喏
喏
喏
喏
，
，
，
喏